



经济研究：问题导向、创新意识和科学方法

● 陈钊 ○ 张卓韧

$\text{\$}\{\text{article.titleEn}\}$

引用本文:

● 陈钊, ○ 张卓韧. 经济研究：问题导向、创新意识和科学方法[J]. 学术月刊, 2022, 54(1): 211–216.

, . $\text{\$}\{\text{article.titleEn}\}$ [J]. Academic Monthly, 2022, 54(1): 211-216.

在线阅读 View online: <http://www.xsyk021.com/article/Y2022/I1/211>

您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文章

Articles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论经济学的非历史性

On the Non-Historical Nature of Economics

学术月刊. 2021, 53(7): 22–35

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说体系和理论逻辑

The Doctrinal System and Theoretical Logic of Xi Jinping’s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学术月刊. 2021, 53(5): 5–16

体制剩余：转轨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范畴

Institution-induced Overage: An Important Terminology of Tansition Economics

学术月刊. 2021, 53(4): 45–55

创新导向减税与就业结构升级

Innovation-oriented Tax Cuts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Upgrade

学术月刊. 2021, 53(6): 87–98

经验地研究法律：基于社会科学的外部视角

Study on Law with Experience:Based on External Perspectives of Social Sciences

学术月刊. 2021, 53(3): 106–113

中国乡村现代化的政治经济学引论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Rural Modernization

学术月刊. 2021, 53(9): 72–84

经济学研究：问题导向、 创新意识和科学方法

——陈钊教授访谈

● 陈钊 ○ 张卓韧



● 陈钊，1973 年生于浙江舟山，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师从张军教授。现为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同时担任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副主编、《经济学报》副主编、*China & World Economy* 领域副主编、《世界经济文汇》编辑。长期从事中国经济问题（应用微观）的研究，主要研究兴趣涉及的学科领域包括：产业经济学（产业政策与产业发展、研发创新政策、环境规制）、发展经济学（城乡与区域发展、户籍制度及其影响、不平等问题）、国际经济学（跨国资本流动）。在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等国际学术期刊，以及《经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管理世界》等国内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二十多篇。出版《迈向社会和谐城乡发展：户籍制度的影响及改革》《在集聚中走向平衡：中国城乡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实证研究》等学术著作，以及《信息与激励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等国家级规划教材。曾入选上海市“曙光学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国家级人才奖励计划”特聘教授称号。

○ 张卓韧，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 陈老师您好！我们很好奇您是如何走上经济学研究这条道路的？能否与我们分享一下？

● 走上经济学的学术道路，我觉得要完成从学生向学者的转变。这其实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其中有几个方面对我来说比较重要。

首先是对经济学的兴趣。我对经济学的兴趣起源于范里安的《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在我大四的时

候，这本书已经由上海交通大学的费方域老师翻译并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我获得了保送本校研究生的资格，所以就有比较多的时间来看这本书，相当于是把微观经济学又从头学了一遍。我很喜欢这本书，到现在仍会向同学们推荐它。主要是因为它跟现实联系得非常紧密。以前我学微观经济学，重心似乎是在做题上，而这本书让我感受到经济学和现实问题的关联。在这本

书的字里行间,你能体会到现实问题背后经济学逻辑和数学形式的对应,这让我感受到经济学的优美。慢慢地,就不由自主地把学到的经济学原理运用到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中,这大大增强了我对经济学的兴趣。

另外一个方面,是我的生活经历。我来自一个小城市,我的外婆和我母亲都是餐饮个体户。在那间大约十平米的小店里,我可以一呆就是半天,还能吃到专门给我做的放了很多葱和猪油的猪油葱饼。换成今天,那绝对是网红店。所以,我从小就对计划经济和市场力量有切身的感受。你应该知道,前不久刚刚过世的经济学家科尔奈有本非常经典的著作《短缺经济学》,在那里我们能学到计划经济的两个重要特征:管制与短缺。但我有着更真切的体会。当时,我母亲从乐器厂辞职想帮我外婆做生意,但一开始却批不到居委会给个体户的定额面粉,因为不相信她会做猪油葱饼。结果她去人家店门口看了半天就学会了。但碰到生意好时,那些面粉是不够的。可没有面粉票了,怎么办呢?我母亲居然想到,把面条用水化成湿面粉后拿去做饼。那时候,也偶尔会有两个人突地闪出来,拿着秤来“称规格”。就是专门来查你做的饼是不是达到规定的重量,达不到就得罚款。于是,我就有机会见识到被管制者和管制者的“斗智斗勇”。在这样的环境中,慢慢地,你就会对各种市场的力量深有感触。甚至可以说,市场的智慧就是伴随着管制而出现的。管制有多夸张,市场的应对就有多突破想象。我所做的一些经济学研究,不过就是换成经济学的语言来讲类似的故事而已。

再一个方面,是复旦优良的学术传统和活跃的学术氛围。我从本科开始一直在复旦。本科的时候,就先后接触到张薰华、叶世昌、蒋学模这些知名的老教授,从他们身上可以感受到一种老知识分子对学问的执着与坚守。在我读研的时候,正好有一批中青年学者陆续回国。他们不仅带来了与中国改革密切相关的新的研究视角,还带动了创新和思辨的学术氛围。比如说,张军老师的一些研究涉及转型经济学和产权理论,特别具有时代气息和问题意识。而且张老师有非常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善于问独特的问题。这种在研究上的创新意识对我的影响很大。又比如说袁志刚老师,他是从法国留学回国的。他开课讲授非均衡经济学,研究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你可以感受到一种学术的传承,因为他的老师贝纳西就是研究非均衡经济学的,而且你也不会觉得生搬硬套,因为他们的理论从来不是凭空出现,而是扎根于中国的现实。那时候还有不定期的学术沙龙,像张军

老师、李维森老师,还有当时的博士后比如张雄老师,都来参与讨论。在今天看来,这些学术讨论并不在方法或工具上有特别值得称道的地方,但身处其中,你会感受到当时青年学者身上的那种学术热情与思辨意识。

○您走上经济学研究道路的经历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即从事经济学研究既需要对理论的系统学习、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思考以及对经济学工具方法的灵活运用,同时也要积极参与到学术交流和讨论中。在经济学研究的道路上,您长期运用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中国重要的现实问题,能否简要介绍一下您主要的研究方向?

●我的研究涉及较多的领域,所以有时候我会说我的研究方向就是中国经济,当然要再加一个括号,应用微观。我早期研究城乡和区域问题,这就涉及城市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近来的一些研究跟产业政策或环境规制这些话题有关,涉及产业经济学、环境经济学。

○不难看出,陈老师的研究方向广泛分布于经济学的众多领域。这似乎迥异于其他“术业有专攻”的学者:大多数学者的研究方向是聚焦于经济学的某一个细分领域。比如有的人专攻贸易,有的人则是城市经济学家等等。请问在您广泛且不断变化的研究方向背后有没有不变的宗旨?

●是的。回过头来看以往的研究,就会发现自己更在意研究的问题导向,而不是学科归属。那些研究题目在我看来都很重要。而所谓重要的问题背后,往往体现出较强的政策意识,或者说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我的一部分研究涉及对市场化改革的理论思考,与未来的改革方向有关。

比如《为和谐而竞争》这项研究,就涉及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的设计。大家都在谈GDP锦标赛,也就是“为增长而竞争”。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诉求其实是越来越多元化的。这些诉求很可能不是GDP就能够代表的。那么,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怎样才能更好地适应这种变化呢?很可能我们需要考虑某种转变。就是从以前自上而下的“为增长而竞争”的央地治理模式,转化成为自下而上的更多考虑地方政府辖区内老百姓满意程度的治理模式。我称之为“为和谐而竞争”。

又比如说关于户籍制度的研究,涉及如何实现城乡一体化。户籍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城乡分割。围绕着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我做了一些理论上的思考,包括这背后有哪些理论的含义,可能会有哪些方式促成

这种转变的发生。

除了对市场化改革在理论上的探讨之外，我也着手进行了相应的实证工作。比如关于户籍制度和居民满意度的研究、户籍制度与居住区分割、户籍制度与社会信任等等。

所有这些研究看上去好像是不同的角度，但其实都是在帮助我们加深对市场和政府关系的认识。所以我觉得问题导向背后是始终关心怎样让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怎样能够让政策改进。

○ 就像陈老师说的，对于中国市场化改革中许多重要的问题，除了理论上的思考之外，实证研究也能帮助我们新的视角来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而改革中的各种政策就典型地体现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策的制定属于政府行为，而政策的运行则是在市场环境之下。陈老师许多较有学术影响力的研究就是政策评估。请问您认为这些研究除了在现实意义上的重要性之外，在学术价值上还为我们提供了哪些经济学方面的洞见呢？

● 刚才我讲到自己确定选题时会看重它的政策含义。但是，除了这一点之外，我也会特别在意选题背后的学术价值。很多时候，这两者其实是可以做到统一的。比如说，对于一些政策讨论，我可能不满足于现有研究给出的答案，想从一些完全不同的角度提供解答。这非常重要，能够使你的研究工作有所创新。

比如说，我之所以会开展对营改增这项改革的研究，就是因为当时发现，文献忽视了这项改革的初衷，而这恰恰是实践中最为关心的问题。营改增费时费力，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改革呢？我在企业调研以及和政府相关部门的接触中，发现大家会提到营改增之前存在的重复征税的现象，而这不利于分工的深化。所以，其实政策制定者最关心的政策目标就是要通过营改增避免重复征税，从而减少交易费用、促进产业分工。当时，我发现有不少文章研究营改增改革，但并没有实证研究为此提供证据。所以，我就特别想用数据来回答这个问题。后来，我们就用了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一些比较巧妙的实证策略，提供了相应的证据。在我看来，这些证据较为可信，而且具有特别微观的视角。

另一方面，这项研究也有一般性的理论价值。为什么呢？因为这涉及经济学中非常经典的一个话题：交易费用的减少能够促成分工。我们知道，从分工到效率，是斯密理论中非常核心的一个逻辑。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非常具有一般性意义的一项研究。

又比如说，最近我们有一项关于住房限购政策的研

究。对于限购政策，只要你身在大城市，就会深有感触。事实上，我对限购政策是有所担忧的。但是，当我去看文献时，却发现我所关心的这个角度，文献并没有涉及。到底是哪个角度呢？简单来说，限购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房住不炒”。那么，限购政策到底有没有帮助我们更接近“房住不炒”呢？这取决于限购有没有抑制住房市场的投机炒作，有没有减轻可能存在的住房市场泡沫。然而，文献却没有触及这样的视角。我到底担心什么呢？我所担心的是，有了大城市的限购政策之后，住房市场的泡沫很可能向那些没有被限购的城市转移。表面看起来，在大城市的限购政策确实是控制了当地的房价。但是随着限购的推开，住房炒作行为可能将泡沫从大城市不断挤到二线城市、三线城市。这可能并不是决策者想看到的现象。因为这可能会为中国未来的房地产市场埋下一些风险和隐患。而我们后来开展的实证研究的确证实了我最初的担心。

所以，看起来我们是在做一些政策评估的工作。但這些工作也带来了更为一般性的洞见，这就是研究的学术价值。最近十多年以来，我有一系列围绕现实政策问题开展的实证研究。在我看来，这些研究至少包括两个重要的视角。

第一个是政策实施过程中央地关系的视角。因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地区间的差异非常大。这就需要考虑中央的政策是如何在地方落实实施的。中央有中央的政策目标，但是地方在实施的时候也有地方的考虑。这就涉及信息不对称和委托代理问题。地方不一定完全按照中央的考虑来推行、实施政策。所以央地关系的视角，在我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前面提到的“为和谐而竞争”就与此有关。

又比如说，在有关产业政策的研究中，这样的视角也非常必要。我们有一些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所考虑的是，中央的产业政策和地方的比较优势是什么关系？地方又是怎样来选择它重点想要扶持的产业的？结果我们发现，中央想发展的那些产业，在中西部地区是没有比较优势的。但是，现实的情况却是，中西部地区在选择地方扶持的重点产业时，会越来越向中央所制定的重点产业靠拢。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西部的产业政策越来越违背了本地的比较优势。

如果中央所制定的产业政策更加有利于全局最优的目标，那么地方的这种做法就是低效率的。举个例子，中央要发展芯片产业。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这是在中国与国的博弈中，哪怕我们做得不是太好，也必须得做

的事情。一旦我们没法自己生产芯片的话,就会被对方“卡脖子”,在国际贸易中处于非常不利的谈判地位。但是这样的产业,到底是由中国哪个地方来承接、来推动呢?如果各地都一哄而上,显然是有违全局最优这个效率目标的。其实应该让最有比较优势、最有潜力的地方来承担这样的项目。所以,央地关系是我在政策研究中特别强调的一个视角。

另外一个更具有一般性的,就是政策分析中一般均衡的视角。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分析的是一个局部均衡。但是经济学教会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或者说一种方法,就是一般均衡。我近十多年的大部分研究,也确实发现我们的很多政策就是由于缺乏一般均衡的考虑,导致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而这些后果甚至完全有违政策的初衷。在我的一系列关于产业政策的研究中,这种一般均衡的视角往往表现为政策具有某种溢出效应。

比如,我们对水污染规制的研究,就发现由于政策存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导致了意想不到的后果。水污染规制是政府在“十一五”期间出台的旨在改善长江水质的环境政策。我们发现政策实施之后,长江下游地区水污染企业的产量减少了。但是,不要忘了,相关污染产业的产品还是存在着市场需求的。结果,这些产能反而被长江上游的企业承接了。这个故事背后的逻辑是,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西部相对欠发达,东部相对发达。这具有一般性。江河的下游很可能是入海口,往往由于地理位置优势而比较发达。因此,欠发达的上游监管力度往往比较发达的下游更低,这就导致了污染产业从下游向上游的转移。这就是政策的空间溢出。但是从效率角度来讲,或者说从环境科学的角度来讲,其实水污染行业布局在江河的下游,是最好的。我们的研究也确实发现,在“十一五”水污染规制政策之前,长江沿线城市水污染产业的重心确实有从上游往下游逐渐靠拢的趋势。但“十一五”期间水污染规制实施之后,这个趋势就遏制住了。两年之后就产生逆转,往上游转移了。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因为这种政策的空间溢出可能会起到一个有违政策初衷的、不好的效果。又比如说前面提到的限购政策,也是政策导致的空间溢出。这就再次提醒政策制订者,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区差异较大的大国,政策的实施需要特别注意区域间的协调。

我们还有一项关于千家能耗企业节能政策的研究,花了四五年的时间。这项研究告诉我们,企业间的溢出效应也是理解政策效果的重要视角。这项政策说的是,

有1008家企业是能耗大户,政府要求它们提高能源效率。当企业面临这样的政策约束时,我们发现了什么呢?企业可能会把产能的一部分转移到和它有关联的同行业公司,另一部分则通过市场转移到同行业的其他企业。这种企业间的溢出效应,会让我们对政策的效果有新的认识。

在另一项关于新能源汽车的补贴政策中,我们发现了产品属性间的政策溢出,并且这会导致与政策初衷完全相反的结果。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是按照续航里程,阶梯式地提高补贴力度。这也被称为基于属性的规制政策。我们发现,企业为了使续航里程达到政策所要求的门槛,可能会改变新能源车其他属性。比如说,让车变得轻一点、功率小一点。这就是政策所导致的发生在同一个产品的不同属性维度之间,更加微观的政策溢出。但是这种溢出带来不好的后果。虽然这项政策的初衷,是为了鼓励企业通过提高技术来增强续航里程、降低产品能耗。但我们的研究发现,这种属性维度之间的溢出,反而使得新能源车的百公里能耗车重比上升。

所以,如果要科学地评估一项政策,不能忽视可能存在的政策的一般均衡效应。我觉得这个视角很重要,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政策的效果,也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市场机制,为经济学研究带来新的洞见。这些都具有一般性的学术价值。

○ 刚才陈老师主要分享了在研究内容方面独到的见解。我们观察到,陈老师近年的研究在方法上也有所拓展,开始涉及国际上新近发展起来的聚类分析法、结构式与简约式结合的估计方法等等。请问您如何看待不同的方法在研究中的运用?

● 确实,这几年来,我们的一些研究开始涉及以往不曾使用的方法,这也得益于向多位合作者的学习。如果你在研究中用到以往不曾使用的方法,这的确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对新方法的掌握,的确可以拓展我们的研究视野。不过,我想强调的是,方法一定是服务于问题的。研究的科学性才是最重要的标准。为了能够更科学地回答我们想回答的现实问题,你首先需要想到的是什么才是合适的方法,而不是迫切想去用新的方法。

比如说,对一些理论问题的思考,就需要用到理论模型。像刚才讲到的从“为增长而竞争”到“为和谐而竞争”,这是两种不同的中央对地方的治理模式。这样的研究是一定要用理论模型的。

我近几年的研究,更多和实证有关。就像前面讲到的,政策的溢出效应非常重要,这时就可能需要用到结

构式估计 (structural form estimation)。比如我们对千家企业节能政策的研究，如果是简约式估计 (reduced form estimation) 的话，就是一个比较标准的 DID 设计。但是大家不要忘记，由于存在着政策的溢出效应，所选择的控制组很可能也受政策影响。就像前面讲到的，千家企业因为受到政策约束，所以产量可能降低了。但是它的产量可能一部分转移到了跟它关联的同行业企业，另一部分通过市场转移到了跟它没有关联的同行业企业。在 DID 中如果要想找控制组，并且为了使控制组跟处理组之间可比，就要在同行业里面找。那么这样找到的控制组也受政策影响，从而可能会高估政策效果。这时候就需要用到结构式的估计方法，建立一个模型来刻画不同企业的决策方式。利用模型和数据把参数估计出来之后，我们就能知道被政策直接影响的企业以及受溢出效应间接影响的企业，分别会有怎样的变化。然后把这两部分效果加起来，才是我们在简约式估计里面看到的 DID 的结果。我们的实证结果也恰恰表明了这一点。所以说，结构式估计有时可以使我们对现实问题的回答、对政策效果的估计更加科学。由此可见，从简约式到结构式这种方法上的拓展，最终还是服务于问题的。

再比如说，我们对于中国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激励政策的研究，会用到一个新近发展起来的方法，叫聚束分析法 (bunching estimation)。这和 DID 或 RD 都不一样。我们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方法呢？不是因为这个方法特别时髦。事实上，我们在这篇文章里是相对比较淡化这个方法的。因为它只是一个方法，帮助我们来回答问题而已。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激励政策是这样的：如果要享受政策优惠，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要占到 5%。我们发现很多企业的研发强度确实在 5% 或者稍微多点的区间里面。这就使得企业研发强度的分布在 5% 右侧扎堆特别多。对这样一种政策导致的结果的估计，就需要用到聚束分析的方法。

另外，有时候我们想知道假想出来的政策会有怎样的效果，也就是反事实分析。这时候如果想得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科学的解答的话，就必须借助结构模型了。因为结构模型能够让我们通过现有的政策和数据来刻画政策对象的决策方式，从而可以让我们预测当政策变化时目标主体的选择，以及相应的一些经济变量或指标会怎么变化。所以说，方法都是服务于问题的，问题是第一位的。

这背后其实也涉及如何看待结构式与简约式关系的问题。我们不必盲目迷信复杂的方法。不存在哪一种方

法更好的问题。方法总是服务于问题，不能脱离问题去谈方法的好坏。

这同时还涉及理论研究跟实证研究的关系。很多实证研究看上去没有理论模型，但其实背后都有理论的判断和思考。在简约式与结构式估计的关系上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做的很多结构式估计会特别有意识地去强调通过简约式估计所提供的一些证据。这非常重要，能够为结构式估计提供一些基本的事实依据，能够帮助我们判断结构式估计得出的结论是不是可靠的。这也说明不同的方法并不完全割裂，而是具有一定的互补性。

所以说研究方法各有千秋，但完全应该服务于问题，根据问题来决定方法。大家不要为了方法而方法，还是要遵循问题导向。

○ 从刚才陈老师对于研究内容和方法的探讨中可以体会到，一项好的经济学研究往往涉及问题本身在现实中的重要性、在理论上的贡献，以及在方法上的创新等各个方面；这背后其实涉及如何选题的问题。借此机会我们想听听您对选题的建议。

● 首先，选题还是要来自现实。如果是从你对现实的疑惑、感兴趣的问题所引发出来的选题，你自己在研究中就会觉得很有意思。而且，你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别人也会感兴趣。

其次，就是要和导师、和他人多交流。我觉得同学对于选题要避免一些误区。有些同学觉得我得先找到一个和导师的研究差不多水平的题目，然后才跟导师去交流。如果你这样想的话，很可能始终找不到好的题目。最终的结果是，你在不断地否定自己、越来越没有信心。如果你真的很有经验、一直在思考，那你可能会突发奇想地蹦出一个好的研究题目。但这是长期积累的结果，别说学生了，你的导师恐怕也做不到。你所看到的，导师的研究选题，很可能也是慢慢磨出来的，你只是看到了结果，不了解过程而已。所以一定要跟老师多讨论，信息的沟通与交流才可能碰撞出好的选题想法。因为每个人的信息集是不一样的，同学和老师接触的信息会有不重叠的部分。当我们交流这些信息的时候，不同的人会产生不同的判断、引发不同的思考。这就好比，我让你告诉我这几天你了解到的有意思的事情，可能在你看来这些跟研究毫无关系，但到了我这里，说不定就成了一项研究的起点，会引发有潜力的学术问题。你们对新鲜事物的了解与接触，加上老师的理论直觉与学术素养，往往会碰撞出重要的选题来源。

所以大家一定要多交流，多了解现实生活。至于选

题具体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对什么东西最熟、最感兴趣、最了解相关的一些现实,你就多去想想、多交流。

○陈老师,我们也关注到,除了高质量的学术研究之外,您还积极将学术研究转化为服务国家、服务决策的政策报告。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关系?

●确实,最近这几年大家越来越强调政策研究,也出现了很多智库。我觉得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两者其实并不矛盾。首先,政策研究同样得保证科学性。在我看来,政策研究首先应该是一个学术研究,应该体现出学术研究中的科学性。其次,政策研究当然得具备政策含义。政策研究其实就是有政策含义的学术研究。

前面我提到了一些研究项目,比如,对于水污染规划政策的研究,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激励政策的研究,对于千家企业能源政策的研究。在我看来,这些既是学术研究,具有一般性的学术价值,同时,也是政策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政策改进的意见和建议。所以我觉得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这两者往往是可以统一的。

○在刚才的访谈中,无论是对于中国经济重要的现实问题的关注与研究,还是对于将学术成果转化为服务国家的智库研究的重视,都体现出陈老师融入每一项研究中的家国情怀。我们作为有志于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后辈,倍受启发和鼓舞;同时也特别想听听您对于经济学职业选择的建议。

●我觉得从事经济学研究,能给人带来以下几个方面的满足感。

我首先想到的是,你能够比较自由和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刚才讲到,经济学是非常强调现实问题导向

的一个学科。我们关注很多现实问题,当下有很多政策。我觉得能够参与其中,进行一些思考和表达,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因为你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可以去选择自己想做什么研究。这在很多职业的里面你是做不到的。然后,我发现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令人开心的事情。

一个是能够持续进步。跟我们接触最多的是学生。看到同学们基于自己的努力能够有收获、有进步,甚至超过自己,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欣慰的事情。特别是,当我觉得自己还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一些作用,能够以合作的方式和同学们共同进步,那就更好了。这里,必须要感谢我的合作者们,从他们身上,我自己以及我的学生们,都学到很多。由于知识的互补性,合作能够拓展研究的边界和领域,相当于我们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就扩大了。这也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情。

另一个就是时时保持新鲜感。因为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会不断思考、不断产生新的问题、领悟新的洞见,这让我们能够解答困惑、接近真相。所以,从事经济学研究,很像职业侦探的工作,开始一个新的研究选题,就是接一个新的案子,往往会有新的未知等待着你。这不是很有趣吗?

当然,关于职业选择,我提到以上这些满足感,并不是让大家都来从事经济学研究,成为职业经济学家。经济学是讲机会成本的,这在职业选择中也一样。你得考虑自己最适合怎样的职业。这需要我们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不要只想着别人会怎样评价你,这并不重要。很多时候,你得先了解真正的自己,才能更从容地做这样的选择。

(责任编辑:沈敏)